

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

魏宏運 著



中國近代歷史的進程

魏宏運 著

廣東人民出版社

前 言

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同志们的鼓励和支持，我将自己三十多年来发表于报刊杂志的有关文章，收拢起来，集成此书，献给读者。

这本书辑了三十七篇文章，涉及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及其结束，反映了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所以以《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为书名。

这些文章，是我一九五一年任教南开以来，授课之余写成的，有的是下了功夫的，有的则显得粗糙。写作的背景，有的是为回答教学中提出的问题，如对孙中山的评价；有的是讲授选修课的详细提纲，如几篇关于武汉政府的文章；有的是应约而写成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工业化与日本帝国主义；有的是出于对历史人物的崇敬和怀念，如对五四时期周恩来思想的研究。有的是我在美国讲学和访问日本时，外国友人提出的，如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问题。除个别地方作了点修改，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拿了出来，这样做，还有一层缘故，那就是“文革”前写的一些文章，特别是关于武汉政府的那几篇，“文革”中成为我的“罪状”。保留原貌较好。

我对问题的研究，大体说来，一是从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

着手，一是调查、访问，把两者结合起来，寻找其内在联系。过去，文献档案公布的不多，我用的材料不少是来源于报刊的，报刊究竟不同于档案，但许多报刊确实记录了极其丰富的近代史素材，只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可以获得有益的东西的。

近几年来，史学研究空前活跃，领域更为广阔，专题性的档案出版了不少。我的一些文章因此显然薄弱了，但我不打算把我过去资料不足的痕迹抹去，因为那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发表的，记录着我做研究的轨迹。我初学写作时还是青年，经过中年，现已年逾花甲。

写文章总是有一种信念支配着自己，鼓励着自己。我应该特别说说我是怎样开始研究五四时期周恩来思想的，那是为了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我和两位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我翻阅了当时所能找到的一切资料，从《检厅目录》中，发现1920年5月到6月初，周恩来在狱中向难友系统讲述马克思主义，这是过去鲜为人知的，这就鼓舞我进一步多方面寻找资料，掌握的越来越多，结合访问调查，对周恩来的形象有了较全面的认识，便先后写了《周恩来同志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周恩来五四时期革命活动纪要》、《觉悟社的光辉》、《周恩来共产主义思想形成初探》，这几篇文章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国内外引起了反响。记得当初我们三人依据资料提出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时，“左”的思潮还禁锢着一些人的思想，他们反对这一评价，我们只好等待时间，用事实来说话。多年来，我总有这个想法，研究近代史要有勇气，不然就不能在1919年后的历史海洋中涉足。

1919年以后的时代，是中国巨大变革的时代，人们对这个

伟大时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仅仅是个开端，很多方面还是空白，我自己理论素养不高，但愿赶上时代步伐，和同行们一起，对这一时期历史，做一番认真的研究。

出版社的同志通读了这本书的每篇文章，在内容和技术上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这个集子是不能和读者见面的。

魏宏运

一九八七年夏于南开园北村

目 录

沙俄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元凶.....	(1)
老沙皇和李鸿章.....	(17)
辛亥革命前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根据地思想.....	(24)
孙中山先生对于辛亥革命经验的总结.....	(32)
——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九十五周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 的成长壮大.....	(39)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工业化与日本帝国主义	(58)
关于“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问题.....	(72)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	(83)
十月革命的消息是怎样传到中国的	(108)
新文化运动的新方向	(115)
周恩来同志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119)
觉悟社的光辉	(130)
周恩来共产主义思想形成初探	(139)
附录：周恩来同志“五四”时期革命活动纪要	(146)
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	(163)
孙中山晚年的农民运动观	(177)

孙中山民权主义研究述评	(182)
北伐时工农大军在解放两湖和江西战争中的作用	(193)
汉浔英租界的收回	(203)
北伐时两湖人民夺取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	(212)
一九二七年南昌武汉之争的实质	(220)
一九二七年武汉革命政府的北伐	(230)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集团对武汉革命政府的颠覆活动	(243)
一九二七年武汉革命政府反经济封锁的斗争	(252)
一九二七年武汉革命政府是怎样走向反动的	(260)
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为什么不去镇压蒋介石的叛变	(270)
略谈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	(282)
有关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七年帝国主义经济侵华的几个 问题.....	(295)
有关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我国苏维埃革命的几个 问题	(306)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分配	(322)
关于“二战”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几个问题	(334)
“不抵抗主义”剖析	(341)
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合理负担政策	(354)
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货币的统一	(362)
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繁荣经济的道路	(381)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战场的几个问题	(395)
五十年来中国人民是怎样为民主宪法而斗争的	(411)
蒋介石时代的结束	(419)

沙俄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元凶

一九〇〇，是新旧世纪交替的一年，也是中国近代历史划时代的一年。帝国主义列强组织起来的八国联军对中国人民的联合进攻，使中国再次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同时它也对中国的革命起了意想不到的催化作用。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联军的暴行面前，少数当权的满人贵族和汉人封疆大吏卖国自存，屈辱自保，暴露了封建主义是民族救亡斗争的最大障碍。反帝必须反封建，必须首先推翻清朝政府。义和团运动悲剧性地表明，旧式农民的反抗斗争已经难以完成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于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孙中山从此不再感到孤立，赢得了愈来愈多的同情和支持。八国联军的组织者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中国革命的反面教员。这也是我们应该具体研究帝国主义者这场盗贼活动和暴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我们这里所要说的只是过去一般研究中所忽略的沙俄这个首席反面教员的作用。

—

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谁是元凶？一般教科书大体是这样排列，即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

意大利、奥地利。英国打头，因为它首先组织了西摩尔联军，但它没有取得什么实际效果。人们也把瓦德西作为主犯，因为他是八国联军总司令；但他在联军进入北京后才到达中国。也有把日本列为祸首的，因为进犯北京时，它出兵最多；但在此以前它并不占优势，而且沙俄也不承认它的主导地位。事实上，始终积极活动，处于霸主地位的是沙皇俄国。

以反对帝国主义为目标的义和团运动兴起之际，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瓜分方兴未艾，都在窥测时机以攫取在华更大的权益，因此，对义和团运动表现了极大的仇视。其中沙俄尤为突出。沙俄驻北京公使格尔思向沙皇献策：“情况千钧一发，只有列强有力坚决的合作才能制止运动。”他并向清廷总理衙门要求“速剿乱民”，“在义和拳还没有强固和还没有在集于北京周围的大队士兵中获得信徒时，有力地将他们镇压下去”^①。当时清朝政府正为义和团运动所苦恼，在沙俄的怂恿下，曾专门讨论了沙俄这一所谓的建议。

到了五月，沙俄又要求“代剿团匪”。清朝政府虽然非常惧怕崛起的人民力量，但对洋人也并不放心，所以对“代剿”没有作出反应。然而沙俄无视清政府的主权，竟然把“代剿”计划付诸行动。沙俄远东部队司令阿列克谢也夫指挥远征舰队的奥列号（Orel）和塔木索夫号（Tamsoff）把作战部队、装备和粮食，从海参崴源源不断运往旅顺；西伯利亚和太平洋舰队的十几艘军舰也调到渤海湾，然后又从旅顺南下，陈兵我大沽口外。

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这时也都忙于调兵来华，但无论在速度方面还是数量方面，都难与沙俄相比。到六月初，各

^①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15页。

国集结在大沽口拦港沙外的军舰共三十余艘，其中沙俄的七艘，另外还有它的两艘鱼雷艇。沙俄还调来了用于进攻的炮兵、骑兵、工程兵、铁道兵、步兵、浮桥队等多种兵种以及嗜杀成性、臭名昭著的哥萨克马队。这样，沙俄以它兵力和装备的优势冠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造成了“英暨各国咸以调兵需时，托俄保护”其在华权益的局面，而“俄集兵既便，又受各国之托已成东方领袖”^①。至六月中旬，沙俄从旅顺调运至天津兵力之多，已为中外瞩目。收在《李文忠公全书》的一封电稿中谈及：“闻俄调兵六千，号称代剿，已有二千到津。”下旬，又遽增。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泰晤士报》星期版披露，俄使馆通知美国务卿说：“四千名俄军已从旅顺调到大沽”，实际上，尚不止此。据《泰晤士报》的报导，实已达六千之数。及至八国联军自大沽登陆，沙俄军数目最多，据一九〇〇年七月六日《泰晤士报》载：

八国联军登陆人数（七月初）

国 别	军官人数	士兵人数
德 国	44	1300
英 国	184	1706
澳大利亚	12	127
美 国	20	329
法 国	17	387
意 大 利	7	131
日 本	119	3709
俄 国	117	5817
总 计	520	13506

^① 《李文忠公全书》第9，函电稿22。

对于这次军事入侵的策划，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现了异常的关注，亲自担任沙俄侵华军总司令，而任命陆军总长库罗帕特金为参谋长。沙俄虽然一再表示其“调兵赴华，只为保护公使，兼助剿匪，别无他意”，但鉴于沙俄半个世纪以来处心积虑侵华的昭彰野心，已引起了其他侵略同伙的疑虑。为了安抚其他同伙，它向美国表示：俄国没有占领中国领土的野心，俄国和其他列强一样，在中国的军事行动，目的在于保卫俄国使馆的安全，并帮助中国政府镇压骚乱。并且说，这是它保卫边境的必要防卫手段^①。这种侵略逻辑，今天也还有人在沿用。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五日，八国联军的各国海军司令在俄国海军上将海尔德布兰特所在的巡洋舰露西亚号举行首次会议，策划如何发动这一肮脏的战争。会议所以在俄国战舰上召开，据说是“海君年岁居长，所以各提督均诣就之，盖欲共商进取之策也”。^②从此，在八国联军侵华的全部过程中，都打上了沙俄发号施令的印记。当六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各国海军头目再次在俄舰露西亚号召开会议，“与海君再议攻守之计”后，海尔德布兰特就以联军的最高指挥官身份发出一份最后通牒，对中国施以恫吓，限令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投降，声称：“本提督以两造情愿之主张，或以兵力从事之目的，暂据大沽各炮台。该各炮台，至迟限于十七号早晨两点钟，一律退让。”并蛮横地说：“此系已决之事，望即达知直隶总督及各炮台官，急速勿延”^③。“两造”都“情愿”的神话，当然不能成为现实，它遭到了罗荣光等中国爱国官兵的拒绝。海尔德布兰特遂在俄舰扑尔

① 见《美国外交档案中国庚子拳乱之部》。

②③ 《义和团》资料丛刊卷3，第268页。

号上开会，决定十六日下午三点，各国侵略军自战 舰 上 强 行 登 陆。

按预定时间，沙俄舰长多布尔乌尔斯基指挥俄舰三艘，即高腊支、机略克和扑尔克号和法、美、德等国军舰各一艘，一起向大沽炮台发动攻击。中国守军当即还击。俄舰高腊支号中弹，机略克号也被打中，引起部分火药间和一个锅炉爆炸，沙俄军十六名丧命，六十七人受伤，一个海军上尉被击毙。沙俄自认“损失很大”，“伤兵折将”。联军亦公认：“俄国人的伤亡比任何国家都要惨重。”这是此次交锋中它所受到的惩罚。

占领大沽后，八国联军的下一个目标是攻占天津。在进犯天津时，联军海军将领会议决定：“公推俄国中将为上级军官，工作甚为协调。由于海军上将会议对一切行动有最高决定权，为了避免磨擦的发生，陆路军队的指挥官也应当与海军上将会议主席，即上级军官为同一国籍的。如目前情况，当为俄国人”^①。这样，使沙俄又一次得到指挥权。在紫竹林、西沽、火车站、东局子等战斗中，沙俄都充当着主力军。天津英法租界因沙俄军的“保护”而得以苟延残喘。侵略者们同声“感谢俄国人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如果没有俄国人的援助，列强小小的远征部队，肯定是要覆没的”^②。

但不可一世的沙俄军队与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一经交战，就遭到严重的挫折。马克里希在《天津租界被围记》中描述了六月二十三日沙俄进犯天津时被义和团包围的情景：“因为义和团使用盾牌，他们（指沙俄军——作者注）冲出包围，死四十人，伤

① 吉·吉普斯：《华北作战记》。

② 《泰晤士报》1900年6月30日星期六版。

二百人。沿着铁路线前进的俄国兵，遇到了主要的抵抗。”沙俄在失败后急速增兵。仅二十六日上午，就开来一个步兵团，约二千人，露营于东站附近，“下午另一部俄国联队抵津，在郊外露营。”由于屡遭失败，沙俄远东部队司令阿列克谢也夫不得不于六月三十日赶赴天津亲自督战。《中国和联军》中记载：“三十日早晨旅顺和辽东半岛总督，俄国远东部队司令阿列克谢也夫赶到天津。”“在他未到以前，大家不愿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因为他可能带来一些关于援军的消息。”^①当时沙俄军在联军中的地位，及其在侵战进程中的元凶作用由此可以得见。

虽然有阿列克谢也夫亲自督战，天津城在清军和义和团协力防卫下仍然久攻不下。七月十三日和十四日，沙俄出动了五千兵力，和德国一起企图用强力打开通道，从城东闯入天津城，其他日、英、美、德等侵略军则从南面进攻，均遭到了惨重的失败。阿列克谢也夫供认，俄兵死伤二百多人，其他各国侵略军则死伤共约七百多。清军握有先进的武器，如能和义和团合力御敌，是可以打败八国联军的，况且八国联军也曾有过撤军的念头。不幸的是到了十四日，清军忽然背盟，退出了阵地，只剩下义和团孤军作战。这样，八国联军在付出了重大代价后，占领了天津城。地处天津城北门外的众多商店、总督和道台衙门、水师营等相继落入沙俄军手中。

攻下天津后，在各帝国主义侵略者间不断发生纠纷中，沙俄更巩固了它在联军中的地位。阿列克谢也夫以霸主身份多次召开会议，调解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其策划下组成了殖民机构天津都统衙门，由沙俄军官华格克担任这一机构的主要头目，

^① 《天津租界被围记》。

对天津实行统治。此时，天津俄军已激增到两万多人，他们把掠夺得来的大批战略物资集中在天津、军粮城和大沽这三个点上，准备下一步进犯北京。这时，联军总司令名义上确定为德国瓦德西伯爵，而实际上瓦德西尚未到达，联军的实际指挥权仍在沙俄中将李尼维支手中。八月一日决定进犯北京的会议就是在李尼维支的营房里举行的。参加者除李尼维支外，有美军少将沙飞、日军中将山口素臣、英军中将盖斯里、法军中将福里和一个德国海军军官。八月三日确定了进犯北京的时间表：各国应参加的侵略军人数，总数为两万，俄军占四千，日军数目陡增，达到九千人。但打头阵的仍是俄国人，他们并且使用诡计保持进犯北京的主导地位。八月十二日八国联军占领通州后，俄军司令李尼维支讹称他不能行动，他的士兵必须休息，通知各国司令官说，要在通州休息一天。开始各国均不同意，经磋商后，才一致同意：十三日这一天用来进行侦察，十四日举行军事会议，商讨次日进攻北京的计划。然而，沙俄陆军少将瓦西列夫率领一营步兵和部分炮兵背着他的盟友，先期单独向北京开始了行动。《庚子中外战纪》中说：“十四日联军准备尚不完全，不意于十三日至十四日之夜间，早已与华兵开仗。俄兵前队至东便门，并未遇阻拒，以为可以暴攻，与通州无异。詎料在此血战，华兵守护极严，急切未能得手。”^①各国侵略军发现他们被愚弄后纷纷表示不满，沙俄却因此写下了抢先进犯北京的记录。它的财政部长维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仍然强调这一点：“对义和团采取镇压措施时，我们是同欧洲列强共同行动的。……我们率先进军北京。”“我们在日军的协助下占领了北

① 《义和团》卷3，第308页。

京”①。

二

沙俄这个野蛮的帝国主义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过程中所制造的暴行，同其他侵略军相比也是极其突出的，在国际上曾引起纷纷指摘，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也留下了难以消失的仇恨。

从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七日八国联军自大沽登陆，到八月十四日抢占北京，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沙俄军队所过之处庐舍为墟，和平居民惨遭杀戮者达数十万人，老人、妇女和儿童也无所幸免。

北塘本有万户人家，劫后只剩下三千户。

塘沽当时是一个有着五万多人口的城镇，后来成了一片废墟。

新河是一千二百多户的大村庄，被烧去了一半。

军粮城那时有三四百户，包括杨台、苗街、塘窪、刘台、李台五个村子，沙俄军队烧杀抢掠把它毁灭了一大半。杨台因靠近铁路，房屋全部被毁。

从大直沽到盐坨相距七华里多，中间的田庄、唐家口、小王庄、大平庄、李公楼、纪家楼等村庄，被烧得一干二净。

对于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这场灾难，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来华后有過一番描述：“从大直沽到天津之间，以及天津重要部分，已成一种不可描写之荒凉破碎。据余在津沽路上所见，所有沿途村舍，皆成颓垣废址，——塘沽系五万居民的地方，

① 《维特伯爵回忆录》第83页。

已无华人足迹。”“至于饥荒疫病之先后继至，实已无疑可言。”^①根据时人的记录，以及近年来在天津所作的一些实地调查，沙俄军队是主要的纵火者和杀人犯。《天津租界被围记》说：“俄国人人见人就开枪，走过村庄就放火”。《庚子天津一月记》中说：“俄人所据地被害特甚，抢掠焚杀，继以奸淫，居民逃避一空。”《中国与联军》一书的作者指出了沙俄帝国主义者的野蛮本性：“沙俄军有一种癖性，就是毁灭中国。”七十年代还健在着一些劫后幸存的老人，他们对“穷老俄”所过之处留下的恐怖和仇恨记忆犹新：

“我家世代代住在新河，沙俄在这一带的暴行，我是亲眼看见的。我们这里流传着一句话：‘塘沽一扫光，新河半拉子庄，北塘三排枪’。”（许得祥一九七〇年回忆，时年87岁）

“我家世代代住在大王庄，八国联军攻天津，俄国兵最凶了。我逃了三次，都睡在开壕，没有逃掉的被俄国兵割去脑袋。”（孙启望一九七〇年回忆，时年92岁）

“那时我家住在田庄。庚子那年，我才十岁，家里有爹、娘、哥哥、姐姐和我，共六口人。我们住在胡同里，见穷老俄来就关上大门，谁知他们往门上洒煤油，放火烧。大火封了门，穷老俄端着枪站在门口，见人冲出来就用刀挑死。我姐姐挨了一刀，没有死，就我俩逃出来了。我走到海河边一看，死人可多了，河槽里尸体都漂满了。”（吴桂荣一九七〇年回忆，时年79岁）

无所不取地抢劫和盲目地破坏，也是沙俄这个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所特有的一种本性。他们需要以掠夺和抢劫支持和补

^① 《义和团》卷3，第18页。

充他们的军需。从军械火药到金银财宝，从大米白面到蔬菜家禽，从牲畜车辆到衣物，无一不在他们抢劫范围之内。阿列克谢也夫承认，八国联军侵占天津时，沙俄从东局子兵工厂、清军兵营中掠去了大量军事物资和财产，从李鸿章的衙门里抢走了三百多门大炮和许多贵重衣物。天津造币厂几百吨银子也被打劫一空。他们对于一切他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占有的人类劳动成果抱有一种敌视心理。俄国兵对那些不知为何物和不能携带的东西，统统破坏掉，它的野蛮与无知，给它的各国同谋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瓦德西《拳乱笔记》中说：“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

杨柳青一带的居民，遭到沙俄军一次又一次的洗劫，一位目击者在八月中、下旬记载下这些史实：

八月十五日，沙俄军窜到杨柳青抢劫了许多车马。

八月十七日，沙俄军和英美法日意军共两千人抢掠焚烧了独流镇，并在杨柳青掠夺瓜果、点心、烟卷、牛羊鸡鸭等。

八月二十日，沙俄军再次窜到杨柳青。

八月二十八日，沙俄兵六人，由子牙河窜入杨柳青，将高姓李姓的衣物抢掠一空。

八月三十日，沙俄兵十二人窜入杨柳青，将石姓衣物抢去。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曾特许其官兵公开抢劫三日。各国的官兵在抢劫上比他们的同伙虽都毫不逊色，而沙俄军往往独能以他们的强盗习性捷足先登。皇宫、颐和园、景山和京师大学堂，都被沙俄抢占。瓦德西在《拳乱笔记》中写道：“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其驻扎地点之分配，一如当时各军攻入该城最初各